

吳耀宗會議專文



編者按：由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及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合辦，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協辦的「吳耀宗與中國基督教」學術研討會，已於2010年6月22至23日假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舉行。是次會議共有14位來自北美、國內、香港及台灣的學者參加，就不同角度探討吳耀宗的生平、思想及對中國基督教的影響，可說是吳耀宗研究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盛事。

是次會議得以順利進行，蒙吳宗素先生（吳耀宗長子）鼎力支持，吳宗素先生及夫人更專程來港出席會議，吳先生更發表了〈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——我所知道的父親〉。有關會議論文經學術評審後，將交由宗文社出版。

吳宗素先生在會議開幕及閉幕禮的發言，特轉載如下。

開幕詞

父親1979年去世，至今已有了三十年了。在自由的氣氛中，舉行對他的研討會，也許還是第一次。我很高興能夠參加，並且發表我對父親的瞭解和懷念。但願這次研討會能夠暢所欲言，真正做到有貶有褒，充分體現百花齊放。

父親是個有爭議的人物，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以後也難取得一致，也許這是正常的現象。我的那篇紀念文，最後一句是「父親是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」，同樣會引發不同的意見。

我已是80歲的老人，自知風燭殘年，來日無多。如果我不憑良知，不實事求是把我所知道的寫出來，很多事實就會永遠被歷史所湮沒。就說父親文革期間的遭遇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以為他和丁光訓一樣受到保護。如今當務之急，就是搶救歷史。

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多災又多難。父親和毛澤東是同時代人。這個時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，是大折騰的時代。社會主義革命逐步深入，就是宗教逐步凋零。父親作為基督教三自的負責人，往往和這個現實被聯繫在一起，往往被認為要對這個現實負主要的責任，而背後的主導力量卻往往被忽視了。

在我有生之年，我有三個願望：

第一是將父母骨灰遷回上海。這個心願，經歷許多曲曲折折，已經完成了。我這次帶來北京墓照和上海墓照供各位參考。

第二是如實回憶我所知道的父親，在今天這樣的研討會上公佈。我知道這篇回憶文絕無可能在國內發表，包括父親一手創辦的《天風》雜誌。希望它能夠通過網路及其它途徑，讓更多的人知道歷史的真相。

這篇回憶文，嚴格來說，並不是一篇論文，只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，羅列出來，供讀者參考，希望有助於對父親的瞭解。

第三是出版父親著作的全集，作為歷史資料，供後人研究。父親的一生寫過許許多多的文章，作過許許多多的演講，但是他的作品在國內外已不容易得到，對有意瞭解和研究父親思想的人來說，不能不是件遺憾的事。上海華東神學院圖書館，父親名下竟然一本書也查不到。羅冠宗先生十年前就提到重印父親部分著作，而且已經有不少的進展，要我幫他在海外找所短缺的資料。但是似乎遇到了阻力，以後就沒有了下文，這個計劃已被束之高閣。我還是希望能夠早日實現我的這個願望。著作的重版和重印，應當是尊重歷史，原汁原味，不以眼前的形勢進行增刪修改。

我想講的就是這些。希望研討會開得順利成功。



閉幕詞

會議開得非常成功，豐富多彩。在此宣讀論文的是這方面重量級的專家學者，旁徵博引，立論嚴謹，從不同方面研究父親的思想和經歷。對我來說，這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。最精彩的是有充分的時間進行交流交鋒，平等理性，相互尊重，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。這樣的自由研討會，不可能在香港以外進行。香港天時地利人和，是研究中國基督教的理想中心。我感謝各位所作的努力。

說到對父親的研究，丁光訓92年給我的信中，提到金陵神學院有人研究父親，希望參考我的看法。我回信說，研究一要有材料，二要有觀點，而現在兩方面都缺乏條件。

材料方面，49年前的書刊雜誌作為四舊已破壞嚴重，49年後只有官方認可、公開發表的文件。父親的日記，本來是最好的第一手資料，有關單位借走，至今無信無義，不肯歸還。學術觀點方面，禁區還是很多。民間研究學者，即使能夠解放思想，超然客觀，高瞻遠矚，成果也很難見天日。因此，研究父親，時下還是以收集素材為上，時機成熟了，落筆也容易了。這是18年前我給丁的回信，現在情況變好了還是變壞了？

至於禁區，我想特別提到邢福增先生最近發表的新作〈革命時代的反革命：基督教「王明道反革命集團」案始末考〉^註。王明道案受牽連的人數眾多，國內外影響深遠，是基督教的一個冤案。為和諧計，為團結計，為實事求是計，都值得重新審查。但是在國內這是個大禁區。聞者或

噤聲，或顧左右而言他。邢福增先生敢於踩踏這個禁區，勇氣可嘉。王明道攻擊父親不遺餘力，但從法制這個高度，從人權這個高度，我還是願意說幾句公道話。

父親常說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，基督教可以有自己的貢獻。目前的中國，道德淪喪，誠信掃地，國人精神空虛，令人憂慮。我真希望中國的基督教大有作為，起到光和鹽的作用。但是我們能提出什麼時代的信息呢？基督教的核心是愛，由此引伸出來的正義、公平、仁愛，又如何推廣到社會？宗教的社會功能在於提升人類的道德標準，這個觀念會不會為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同？

父親也一直認為，宗教比一切社會意識形態有更強的生命力。是不是這樣呢？現在國內有越來越多的人追求精神和心靈的需要。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，短短的幾年就湧現出幾千萬的教徒，可惜父親看不到了。最近讀到六四學生領袖柴玲歸咎基督教的見證。她第一次接觸基督教就在北大。

柴玲、余杰等人，不是個別的例子。北大清華等校的學生，早就有自己的團契和教會，在中關村租有半永久性聚會場所，每週有幾百人參加。北大清華是現政權接班人的搖籃，思想控制嚴格，出現這種現象，豈不令人深思？

宗教比社會意識形態有更強的生命力，中國的基督教也會有自己強大的生命力。

這次的研討會完滿結束了。我再次感謝會議的組織者，各位工作人員及全體與會者。 ▽

註：編者按：本文刊於《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67期（2010.3），頁97-147。